

金钱说了算，但是它在说什么？货币符号学和社会控制

卡尔·温纳林德 著

陈文斌，胡易容 译

货币是所有经济系统中最神秘的体制之一，从古希腊的莉迪亚（Lydia）到无现金的现代金融社会无不如此。由于货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理论家们已经研究了它的本质、角色和功能。虽然微观经济学家们似乎厌恶研究货币，但这个许多人研究的课题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货币的经济职能。¹ 也即是，我们已经在操作性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发现了货币的经济职能中最高效的投入/产出方程式。然而，尽管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货币的经济职能，但不愿恪守教条的经济学者们却日渐认为，我们还没有理解货币及其使用的某些显著特征，如它的文化、政治、社会语境及内容。

金钱并不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动态社会结构状况所形成的复杂网络的一部分，人类在其中进行活动并彼此互动。就此而言，货币是社会关系的呈现，它调解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² 此种社会关系的不同不仅取决于货币特征。货币特征建立在所有权（ownership）和交换机制（exchange mechanisms）基础上，它们反射性地建构且制约了货币的存在——对于不同的

¹ 当代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发现货币研究与他们的总体方案（general project）有微弱的相关性，因为根据他们理论中的微观经济学规范，货币仅仅发挥着—一个便利但并非必要的功能。参见 Hahn 1965。（原作者注）

² 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 Ingham）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有说服力地举例阐述了为什么货币应该被理论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原作者注）

人的来说，金钱也同样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这与支配他们行为的目标和理想是相一致的。显然，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人被货币功能所确立的参数所整合，但金钱在人们之间传达的意义却比密电更难破译。货币传递了什么信息？人们又当如何解释它们？对于货币的社会意义的考察或许会揭示一些信息，帮助我们理解货币关系，提供关于财政混乱和金融危机动向的深刻洞见。此外，更准确地理解货币的意义或将令我们看清第三方介入会如何曲解、校改，或阐明货币话语的内涵。

某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制度经济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已经注意到现代社会中缺乏关于货币交流功能的分析。学者们尝试通过符号学去拓宽对于货币的分析。符号学是一种对符号系统中意义的研究，它借用了语言学的规则。本文旨在进一步运用符号学方法，深化我们对金钱及金钱使用传达出的意义和经验的理解。第一部分内容，是关于符号学的简述。第二部分阐明符号学与货币研究的关联。随后的第三、四部分探讨了奥地利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在货币分析领域中以往的符号学处理。³ 第五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货币的解释来加深我们对货币符号意义的理解。讨论尤其集中于货币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的分析。

符号学

宽泛地说，符号学是一门传统的学问，它研究那些借助符号和象征得以交流的意义、经验和知识。符号学家们指出，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于，通过设想人类社会是由共享的符号和意义所构建的系统，我们对人类社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在不同生活场域中，人类借助符号和象征去交流意义并创造共同经验，具体手段如艺术、音乐、建筑、举止、着装、空间布局和

³ 这篇论文不应该被纳入货币符号学历史。这样的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所以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应该需要更多的空间和调查。（原作者注）

物质财富。事实上，我们能够将意义赋予到任何能唤起思想、意识和情感的事件、行为或对象上（Applebaum 1987, 477）。将符号作为一种渗透整个人类社会的重要话语形式来使用，令符号学正在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因为人与人之间首要的符号交流形式是口语和书面语言，所以符号学最频繁地被用于语言学领域。不过，符号学也被经常用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经济学中。

符号学领域中的开创性工作包括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983）、美国实用主义者查尔斯·皮尔斯（1931-58），和德国解释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1985）。虽然众多的符号学理论存在显著差异，但他们仍有一些共通的主题：

（1）符号学家们设法建立——或具体化——通过符号交流而生成的意义、经验和知识的存在形式，这样，信息从文化角度被界定，其转移就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被研究。

（2）符号系统被认为是由一个符号和其他符号之间复杂的意义/经验关系所构成。这种关系通常是一种对比和层次结构。据此，一个符号的意义只能在与符号系统内其它符号的互文关系中被理解。换言之，符号学研究往往着眼于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在自给自足的元素网络范围内表达思想和意义，网络中的元素通过彼此关联进行表意。（Silverman 1983, 6）

（3）符号经常具有多义性。外延（即定义性含义和字面含义）和内涵（即社会文化联系）之间不断地产生区别。很多分析运用了符号学传统，注重揭示非显性和经常无意识循环的内涵义——也即更深层的、常常隐藏在符号交流背后的话语。这使得符号学家们去研究隐喻，因为隐喻是产生内涵的主要手段。以一种无关但熟悉的意义模式建构符号，符号的隐喻性内容可以传递一种无法即刻熟悉和符合常识的意义和经验。

一般来说，符号学方法并不会尝试去确定一个真实的意义，或者是找出符号的性质或本质，这一研究更多是针对凝结在一个符号中内涵和外延的多义性。举例而言，符号会有浓缩意义，从这一角度来说，它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对象之间的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个人

行为、互动以及相互影响。符号学方法揭示的内涵意义、经验和知识并非官方或公开明白的常识性话语。⁴ 在这样的例子中，符号学路径使得我们理解社会生活表现中隐藏的符码，并揭示从前遮掩的、模糊的权力关系。揭露一个符号的隐含意义可以推进质疑和挑战符号宰制意义的进程，破坏普遍化的、常规化的、合法化的符号系统。⁵ 在这个意义上说，符号学强力批判了文化秩序中的意识形态元素。

符号学和货币

经济学家们已经运用符号学去理解价格、市场和货币的交流特性。语言学话语和货币交易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显见的共性就是，它们都是一种符号系统，是参与者之间交流社会知识的工具。口语或书面语通过词汇传递概念和意义，而金钱则常常是匿名的财富所有者市场交易的交流媒介。进一步说，语词在语言之外是不表意，同理，金钱在货币文化之外也不能被理解。因此，两者都是自给自足的话语系统（discursive system），各自系统中的符号意义与经验必须在其符号操作中实现指称并予以解释。没有一个超语言或超越金钱的外在现实来帮助人们理解这些符号。此外，语言因其使用语境而具有不同意义，而金钱使用者之间的交流体验则不同于这种自身之间关系的依赖。换言之，货币符号并非金钱本身。⁶ 事实上，

⁴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公开的文字记录（public transcript）是下属和统治者用来描述公开、正式的活动的。它与隐藏话语（hidden transcript）并行存在，在隐藏话语中，交流的是权威经验与权力关系。（原作者注）

⁵ 根据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说法，使（事物）一般化、常规化、合法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些主要功能。（原作者注）

⁶ 就像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的，“没有事物本身就是货币，任何事物在一个合适的领域都

货币可以交流多种意义，这取决于符号在现实中如何被建构。

奥地利学派的符号学应用

在一个最近的货币语义学研究中，斯蒂芬·霍维茨（Steven Horwitz）（1995）在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传统之上建构了一种货币表意的研究。在他的解释中，货币价格显示了偏好和品位，同样也反映了获利机会。这些作用对于社会解决散乱的知识问题是必要的，⁷ 同时又维持着一个稳定的自由秩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货币扮演了语言机制的角色；正如霍韦兹所说，“很大程度上，口语及书面语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使得社会中的个体间能相互理解，因此，货币与价格令经济行为能在市场上维持有序的进程。”（154）。霍维茨对现存理论框架具有双重贡献：首先，他将我们的注意力带向了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设想的货币内涵义；其次，通过使用伽达默尔（Gadamer）的理论，他尝试揭示货币和语言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加强两种交流方式之间的隐喻性结合。更有趣的是，霍维茨详述的这个理论在大卫·休谟（David Hume）那就有了意料之外的先兆，而休谟是一个至今未被承认的货币符号学家。

在他的经典著作《货币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1978）中，齐美尔声称货币最主要的角色之一是在匿名的个体之间散布信任，这为建立巨大市场网络奠定了必要基础。信任元素在这里被视为“其他人平等地将货币商品视为一种交易媒介的信念”（Horwitz 1995,

可以充当货币。”（1968，175）（原作者注）

⁷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指出一个试图去配置稀缺资源的不协调社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关于偏好和成本的信息并不为每个人所全部了解。因此，为了解决这个信息太分散的问题，市场主体之间必须可以自由交流行情。（原作者注）

159)。齐美尔认为，通过参与货币交易，个体显示了他们对于货币的信任和信心。这种显示又传递给更大范围内的公众，个人也在社会秩序中分享了共同的信任。因此，越大数量的人们希望将信任交予货币，则社会单元越多共同利益得以再生产和维系。⁸ 参与者将匿名的其他人建构为足够安全可信的贸易伙伴形象。其释放的信号创建了大量匿名行动者的合作经验，进而使得在没有意图明晰的直接面对面的完全信息情况下，市场和贸易仍然能进行。霍维茨恰当地指出，无论西美尔的成果与奥地利学派的关联如何，他阐述的货币意义的符号学都被后来的解释学者忽略了。

霍维茨也详尽地将语言和货币之间共性描述为一种自发进化的经验媒介。同样，他详尽地引用了伽达默尔的著作（Gadamer 1985）。伽达默尔声称，语言特别重要的特质是它允许在使用者之间分享共同的理解，且这种共享的产生无须控制交流的权威在场。

通过语言的知识交流创造了一个共享经验和认知的世界，这一世界完全是由语言的使用来定义的。伽达默尔解释说所有可知之物通过语言被认知，“任何理解都是解释，并且所有解释均以语言为媒介”（Gadamer 1985, 350）。霍维茨发现在市场系统之内有一种类似，原因是货币价格（money price）与有待被解决的散乱知识问题的全部必要信息相通。因此，就像语言一样，货币是一个自给自足和自我指涉的系统：“当我们思考时，唯有诉诸语言而别无他法；我们在市场行为中同样别无他途而只有凭借货币价格来达成交易的意愿。”（Horwitz

⁸ 货币信托体系（fiduciary systems of money）很明显是需要诚信的。但是，齐美尔（Simmel）认为即使是金属货币也得以诚信为前提。“首先，在每天的交易中检查硬币的金属性质是不可行的……其次，让人们相信，被收下的货币能被再次以相同价值使用”（1978, 178）（原作者注）

1995: 165)。

霍维茨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理性系统或者社会计划者的支持和控制之外,语言得以进化。人类并没有理性地或者本能地选择一种语言,而语言通过创新、模仿和学习,已经随着时间推移而进化。这一哈耶克式文化演变的过程,并非源于一个宏伟的社会计划,而更多的是源于所有社会成员间的互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意识和无计划的产物。在决定一个团体应该追求何种新形式的规则的过程中,他们倾向于采纳那些使更好的社会及经济生活成为可能的规则。同样地,协商要素不会完全缺席。货币再一次成为这里的纽带,因为货币系统并非依照理性计划去建立。相反,随着社会演进,控制交易的一系列规则和传统自发地出现了。

通过借鉴齐美尔和伽达默尔,霍维茨认为货币象征着信任,并详尽说明作为话语系统(discursive system)的货币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霍维茨对于货币的符号学分析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传统相一致。然而,他的分析并非仅限于奥地利学派。事实上,对货币在匿名个体之间表达信任的作用的分析早已被休谟设想,休谟在信托资金(fiduciary money)开创期就已经著述过。在《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76)一书中,休谟提出了货币的符号学分析,从强调货币是个体之间表达信任的重要作用这方面来说,他几乎预言了齐美尔的观点。休谟也提出了货币是一个自发进化的社会制度,它为普及市场交易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纽带。⁹

休谟认为一个没有发达市场的社会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由于实物交易(barter trade)有诸多缺陷,它严重限制了匿名个体之间的交易范围,休谟认为参与这样的交易必须认可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允许超越这些限制。非实物交易(non-barter transaction)让一方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务以换取承诺,这是不安全的——口头允诺不能使他们彼此联结,因为本性、理智

⁹ 我在其他地方对这些想法有更详细的阐述(Wennerlind 2001)。(原作者注)

或者意志都不会生发责任心。休谟认为必须创建一些内部机制，以此鼓励个体们去克制他们的私心并兑现对他人的诺言（1978，518-9）。他建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采用一个约定的协议，即符号来充当兑现承诺的保证人。这种符号性交流因此增强了信任的可能性，承诺将会被尊重并且非实物交易可以完成。最初，作为一种承兑票据，符号只会在特定个体之间有效。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手段的社会性效益，这一符号将会通过公约——在没有外部法令的条件下逐步兴起——变得无差别且发挥像货币一样的功能。这一符号因此成为一个普遍的代表和中介，对于任何出示这一符号的个人，它都意味着承诺交付一定量商品给对方。在这个符号系统中的参与者通常会向社会承诺在交易中接受符号作为一般等价物。就符号能成功传递信心来说，有必要锻造巨大的贸易网络，以货币使用作为承诺的象征，对此不尊重的惩罚和驱逐成为重中之重。

总之，休谟的分析强调了货币在匿名个体之间散布信任的重要性，广泛的社会联系因此得以发展。同样地，他预示了齐美尔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休谟也认为货币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它和语言一样会一代一代地自发演变。¹⁰ 这个自动进化的社会交流机制的概念与伽达默尔建立的理论相似。霍维茨、伽达默尔和齐美尔之间的联系表明，这一符号学分析的形式起源于 18 世纪，当时信托货币（fiduciary money）首次在广泛基础上被使用。从此以后，这种符号学分析形式植根于围绕建立一个信托货币标准的实际尝试。

休谟和奥地利学派指出了货币如何在社会行动主体之间交流信任。然而，他们的分析有点局限于他们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基于所有人参与货币系统都有内在利益这一

¹⁰ 休谟（Hume）写道：“同样地，语言借助于没有任何承诺的人类公约被逐步建立起来。金银以相似的方式成为交易的通用衡量单位，而且被视为足以支付百倍于它们价值的物品。”（1978，490）（原作者注）

假设，休谟和奥地利学派争论说这样一个系统起源并成型于一个和谐的进程。这一假设意味着，伴随着新的产权制度¹¹、交换机制¹²和货币，所有行动主体肯定有成为新社会形式一部分的内在利益。换言之，所有行动主体必须将新商业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内化。毋庸多言，资本主义实际的历史发展比休谟和奥地利学派所认为的更具争议、更加剧烈。人们所宣称的个人利益在货币机制中必须被控制；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这样才能创造对于货币的信心。¹³对一些人而言，货币并不是一种合作的社会关系而是互相竞争的社会关系。附着在货币上的暴力、恐惧和死亡的意义同样重要。¹⁴

制度经济学派的符号学应用

¹¹ 参见麦克弗森 (Macpherson) 1962 年对新产权制度的分析。(原作者注)

¹² 参见波兰尼 (Polanyi) 1944 年对新市场机制的分析。(原作者注)

¹³ 例如，参见乔治·卡芬特齐斯 (George Caffentzis)、彼得·莱恩博 (Peter Linebaugh) 和哈利·克利弗 (Harry Cleaver) 的分析。(原作者注)

¹⁴ 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剪下、削去、用锉刀锉或者伪造金银硬币是死罪。等到纸币成为一种重要的货币形式，伪造纸币即死罪的法规在十八世纪即被通过。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准确地说是新泽西州，纸币在表面印有严苛的警告：“伪造即死罪” (Angell 1929, 86)。许多人将这类货币犯罪视为产权犯罪(e.g., Beattie 1986)。但是，事实上，这更是一桩严重的犯罪。货币犯罪不仅在货币流通领域，而且在整个贸易秩序内和整个支持货币流通的国家机器内都逐步削弱了信任。考虑到那些被定为造币犯罪的人 65%左右被处决，而那些被定为资本犯罪的人只有 49%被处死，十八世纪英格兰法庭意识到了这一威胁的严重 (Styles 1980, 347)。进一步的分析，参见 Wennerlind 2001。(原作者注)

一些作家批评奥地利学派对符号学的应用，理由是它几乎严格地着眼于经济意义的解释（Velthuis 1999）。艾伦·戴尔（Alan Dyer）提出了一个货币的符号学分析，他借此去避开经济主义的陷阱。基于人类学的视角，人类社会能作为一种符号关系之网中得到理解，其中货币被视为解读资本主义的关键符号，他认为货币具有更宽泛的文化与社会符号学意义（Dyer 1989: 503）。

戴尔反对许多经济学家将货币角色边缘化的做法，无论是就货币对现代经济的发展而言，还是基于它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事件上的决定性作用来看，货币的角色都相当重要。而经济学家们普遍不认为货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的组成元素，而仅仅将它视为其他转变的一个必然结果。追溯至启蒙运动，经济学家们已经创造了虚构的阶段理论，即从劳动分工到市场交易最终到联结货币的一种因果链（Meek 1976）。戴尔对这一推论（或历史逻辑）的挑战得到了来自实质主义人类学家工作的支持。他们的工作提供了大量实证，表明劳动分离并非是引起市场交易的必要因素，市场的建立也并非是导致货币形成的必要因素。¹⁵ 戴尔进一步认为，当代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充分重视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许多宏观经济学家们认为，货币就是一层面纱，它对于实际变量（real variables）的决定只有很小的甚至没有意义；同样，微观经济学家们也不常讨论货币，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础并没有明确提出货币是一种必要制度。

与这种长期存在的传统相反，戴尔认为货币在建立和维持金钱文化（pecuniary culture）上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声称货币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是创造一种共享的经验，资本主义可以在

¹⁵ 例如，道尔顿（Dalton）1967年编辑的论文，以及波兰尼（Polanyi）、阿伦斯伯格（Arensberg）和皮尔森（Pearson）1957年的文章。（原作者注）

其中发挥作用。因此，他建议通过命名——或代表——对象或体验，让货币就像现实中正常商品一样激励我们去行动。他争论道：“通过再现对象和体验，将其作为交换价值的类似容器，货币象征性地改变了生活，并因此调解了我们对它的理解”（1989，505）。换言之，金钱创造了一种概念性的环境（conceptual milieu），在这种环境中，我们的想象力和行为被改造，这导致了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商品化——而这两者都是典型的非商品。

戴尔试图超越狭义的经济意义来扩展货币解释，他坚持认为货币是当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这是他对货币的符号学分析的一个重要贡献。尽管如此，他的分析在两方面有所缺失：首先，尽管戴尔将货币孤立为文化转变最重要的制度，他却没有为货币的多元意义提供一个定义。他忘记了货币本质上并非货币自身，它的意义是在它的社会学语境下自反地被定义的。当然存在这样一种文化，货币存在于其中，但自然和生活的一切都没有被视为商品。举例而言，在古代社会，市场上既不交易土地也不交易劳动力，货币传达着与今天完全不同的意义。根据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的观点，“在些极端情况下，古代货币利用某物当作支付手段，使用另一些物品作为价值尺度，还有一些物品被用来存储财富，再一些则是被用于交易这一目的——就像一种语言，动词包含一些字母，名词包含另一些字母，形容词包含又一些字母，副词又包含一些。”（Polanyi 1968: 179）。

其次，戴尔不恰当地将货币视为一种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拉科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1980）认为结构隐喻唤起了关于世界的特殊构想，这种构想最终决定我们的行为。举例而言，他们用“争论如战争”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隐喻已经建构了我们在西方文化中对待争论的方式。他们指出如果这个隐喻被另一种隐喻“争论是一种舞蹈”所取代，“人们将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争论，体验也不同，执行起来也不一样，谈论起来也不一样”（1985: 5）。同样的，戴尔认为这种要求超越金钱文化的改变“将会引起符号学的符码（code）和象征（symbol）发生改变，通过这些改变，经济和社会生活将会充满意义”

(1989: 508)。因此，他提出，如果选择不通过货币来符号化世界，可想而知的是，人们将以一种彻底不同的方式去连接自然和彼此。

整个分析中，戴尔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符号意指关系只发生于在一个独立和自指的系统中。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中，货币只能通过与其他符号的联系才能表示意义和经验，比如与私人财产与市场。因此，货币在面对系统中的其余部分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货币的隐喻就不是一个结构隐喻，也不能反过来映射什么。如果要在我们与自然和其他人的联系方面发生一个有意义的改变，不仅仅是货币，资本主义所有重要的机构都必然有一个转变。¹⁶ 比如，与戴尔相反的观点是 (Dyer 1989, 509)，我们与环境和其他人的关系并不会仅仅因为货币符号意义的再度呈现 (re-representing) 而发生变化。为了超越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提到的“技术性态度” (technological attitude) ——即把人和自然视为一种专门为我们的利益贡献资源的长期储备 (1977) ——我们不得不超越关于利润的经验、私人财产、市场和雇佣劳动，还要超越货币。即是说，对于由货币来界定整个符号系统初始意义这样的论点，我们需要有一个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应用

货币的符号学分析同样也是社会学家们的课题。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发展了一套详尽的分析，即货币被视为一种“符号化的广义交流媒介” (1967: 306)。他指

¹⁶ 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 (Pierre-Joseph Proudhon) 以及英国欧文主义者布雷 (Bray) 和格雷 (Gray) 提议，通过用人力货币 (labor money) 或“时间代金券 (time chits)”代替现存的货币形式，资本主义可以发生巨大转变，马克思 (Marx) 批评这一观点，他指出这种改造对资本主义职能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原作者注)

出，货币作为符号，是因其无用、无自身价值，且作为一种交换价值的等效介质。此时，符号通常按照人数比例显示其可信度与信心。尽管如此，他提出了一个延伸的分析框架，通过宣称货币符号化效用与信任，他并未冒险超越奥地利学派的分析判断。¹⁷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社会学家海纳·甘斯曼（Heiner Gansman 1988）直接将货币符号学导向了一个更有趣的路径。甘斯曼宣称，货币必须被视为一种支配性表意而非无关政治的帕累托改进。他指出在一个商业社会中，被剥削群体为了分到一些社会财富，不得不为了金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这种劳动的商品化使得被剥削者失去了他们对自身劳动力量的支配。

通过强调立足货币核心的权力关系，甘斯曼的分析主要关注货币如何能被当做一种工具去逼迫被剥削群体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详尽分析货币在人民与阶级之间所传递的权力内容。货币作为资本和价值存储工具，可以被视为一个主要的符号、一个在资本主义中连接社会控制和社会权力的传播者。有一种说法是，马克思的分析暗示着铸造货币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非人格化和物化，另一种说法则与之相反，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反而让我们聚焦于货币，将其视为传达主观意义和经验的主要载体。

正如前面提及的，货币表意因制度语境而异。例如，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意义并不相同。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其他社会制度与货币共存，并自发地定义了货币的含义。最重要的制度是当时盛行的分配机制以及统治人类劳动和自然的产权分配制度。鉴于在原始社会，上古社会，古典社会（ancient），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交易模式和所有制结构上有着根本的差异，不同类型的货币其可通约性的确是受限的，因此将术语“货币”作为一个包罗广泛的能指在语义上是可疑的。只有通过改造我们关于货币和社会其他核心制度关系的理解，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到货币在人与人之间所传达的意义。

¹⁷ 对帕森斯（Parsons）更广泛的批评，参见多德（Dodd）的第四章（1944）。（原作者注）

当劳动、自然和商品被私人的排他性财产所统治，并且被内部市场所交易的时候，资本主义的货币被创造出来，其可以有效地被称为一般等价物。私人排他性财产（private exclusionary property）是指一种产权结构，即代理人被准予享有拥有、使用、管理、转让、转移和获取可能有的收入来源的所有权利，还可以驱除他者接近这些财产（Christman 1994, 15）。内部市场（internal market）是指那些在功能上互相联结、很大程度上自动调节的市场，这些市场吸纳了自然和生活中所有重要元素（Polanyi 1944, 68-76）。土地和劳动力的合并进入私人排他性财产领域、内部市场的出现、以及一般等价物的形成，卡尔·马克思将这些相同的共生过程称为“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1976: part VIII）。对那些使用货币的人而言，定义了一般等价物的含义，这一品质特征只会在劳动力和土地被归为个人排他性财产、且在内部市场中交易的背景中形成。事实上，在缺乏这种由经济三位一体（economic trinity）催生的语境时，我们不可能恰当地设想出这些制度中的任何一个。因此，一般等价物与前资本主义（pre-capitalist）的货币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资本主义的货币只能调解一个狭窄范围内的物品，最重要的是，它并不能调解劳动力和土地。

以社会权力作为它的主要意义之一，一般等价物调解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中，几乎所有生活和自然的元素都被经济三位一体所控制，社会权力要有支配劳动力、资源和商品的能力。¹⁸ 在这样的环境中，货币充当了对于社会财富的一般声明，它授予了行使权力制约人民的特权。同样地，货币成为社会权力的最高象征，并允许它的持有者去表明这种力量。马克思声称“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货币的力量呈递增趋势……所有东西都可以用于

¹⁸ 当然，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力和资源也被视为商品。但是，就像波兰尼指出的，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商品，而只是虚拟商品。（原作者注）

销售和购买……因此，社会权力变成了个体的私人权力”（1967：229-30）。在一个不同的点上，马克思描述了拥有货币的经验，通过引用歌德《浮士德》中的话“我，作为一个个体，是跛脚的，但是金钱提供给我二十四只脚。因此我不再跛……我，感谢金钱让我拥有人类向往已久的一切，拥有所有人类的能力”。（Marx 1964，167）

为了扩大社会权力，货币不能闲置，¹⁹ 而是必须作为资本用起来。当被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即持续扩张的积累的时候，一般等价物扮演了资本的角色。当生产进程获利时，积累就取得了成功，反过来，只有当被雇佣的工人合作——也就是被控制、被训练——从而在劳动过程中遵从雇佣者指令的时候，盈利才得以可能。必须有充分的训练和控制才能确保工人们为雇主生产剩余价值。同一个行业的雇主之间有越大的竞争，雇主们就有越大的压力去加强纪律性、加强管控，以持续积累过程。这说明了通过对生产过程中的工人们施加控制和纪律，社会权力被获取并再生产。一个代理人所具有的社会权力是与其对劳动过程中人们的社会控制程度成正比的。因此，货币是价值的能指，从资本的角度看，价值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措施。那么由此可知，为了再生产和扩大社会权力，货币资本必须被持续地运用于施加社会控制的进程。

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积累的两重性变得显而易见。一方面，积累导致了顺从，这是从对工人规训和控制来看的，另一方面，积累产生了效用，以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形式。²⁰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这一创造性的破坏是通过某一过程带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人的积累与对资本的积累是不能割裂的”（1979，221）。总之，积累是以被迫劳动的手段在人们身上建立一种控制和规训。所以，货币同时指向了社会权力和社会控制。

¹⁹ “如果我依赖货币，它就会在我手上蒸发掉变为真正财富的幻影”（Marx 1973，234）（原作者注）

²⁰ 我已经在我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详尽阐释。（原作者注）

²¹ 因此，货币资本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这种社会形式的表达，同样的，货币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除了提供资本作用外，货币还是还可以储存价值，或者说，存储命令。它允许人们进行一场没有立即获得他们想购买的商品的交易。作为一种储存价值，在某一个产业或者某一地理区域获得的货币可以控制其他任何地方的商品和人，即作为一个控制的符号，货币可以在所有商业化语境中传递相同的内容。这意味着，通过在一部分人身上强加社会控制来获得社会权力，这已经不再限于那些被直接剥削的人了。货币允许在一个产业或地域获得的社会权力，能够被转移且应用到被经济三位一体所控制的其他任何部门或领域。权力被保留在货币符号中，而不是在某一特殊主体的身份中。因此，社会控制变得匿名且流动，因为货币不再依附于某一特定身份。²² 通过把社会控制变成社会权力这一相同进程，货币褪去了宰制和剥削的外表，变成了一个受追捧的权力符号。更确切地说，虽然社会控制被强加于一个武力、暴力和斗争的具体情境中，但是当社会权力通过货币进行表征时，它戴了一层清洁、纯净的面纱，这个面纱模糊了社会控制经常诉诸武力和暴力的事实。

在经济三位一体统治的社会中，一般等价物是一个分散的、匿名的、流动的社会权力符

²¹ 无限制地积累，或者为了积累而积累，有时会创造出一种“肛门克制型 (anal-retentive ，译者按：指具有谨小慎微、贪婪，和固执的性格特征的，源于与儿童时期克制粪便排泄产生的快感有关而形成的习惯，态度和价值观)”的形象，比如店主坐在他的美元和美分上，用一只装弹的霰弹枪时刻准备着抵御任何入侵者。虽然肯定有很多这样病态行为，但无限积累的主要动力是源自于对社会权力的竞争。(原作者注)

²² 与无个性的货币符号相对照，封建阶级权力用领主身份来象征。有意思的是，有些国家的硬币的一面仍旧铸造着君主的半身像，我们在其中发现了新旧两种象征权力方式的混淆。(原作者注)

号。²³ 如果我们将内部市场视为一个可以协商和重排产权关系的话语空间，一般等价物就是在这种交流中要使用的语言。尤其是，货币还调解着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的占有者与非占有者、生存资料（means of subsistence）的占有者与非占有者、劳动力的购买者与出卖者之间的阶级关系。在所有这些关系中，货币调解并控制着各方的合作和交流。那些控制生产和生存资料的人有权力将他者排斥在他们财产之外，也可以用饥饿的威胁去榨取被剥削者们的劳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剥削者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一种异己的方式从事生产，在这种劳动过程中他们是处于资本的控制和统治下的。可是，如果被剥削者能够获得足够的金钱，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将自己从雇佣劳动的统治中解救出来。这些或自愿、或被迫的交易重塑了统治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认识到他们在社会层次结构

²³ 仔细的读者已然注意到马克思认为货币并不是一个符号。但是，马克思对于货币是符号的批判在十八世纪信托理论（fiduciary theories）中受到攻击，休谟的理论（就像之前讨论过的一样）认为货币的实质是信任（Marx 1976，185）。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价值的一种形式，价值的实质是抽象劳动。这意味着货币是抽象劳动的一种表达，反过来，抽象劳动是指一种有助于社会控制资本的异化工作形式（De Angelis 1995）。因此，马克思批判将货币视为符号这一观点，始终围绕着他坚信货币的根基是社会关系的具体现实，而不是理念和想法（信任和信心）的临时反映这一中心。以这种方式解释，马克思的分析适用于所有的资本主义货币形式，不管其主要成分是金属还是纸。事实上，他认为纸币可以和金子一样发挥作用，只要“纸币的发行数量与实际上在流通、纸币所象征的金（或银）一样多”（Marx 1976，224）请注意一些作家认为马克思关于货币的理论仅适用于商品—货币系统（Fleetwood 2000；Kennedy 2000）。这些争论是立足于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的不同解读，而不是立足于此处提到的理论。（原作者注）

中的位置。当然，货币在这里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黑格尔式的主奴经验得以传达的符号化手段。

权力斗争往往遍布资本主义的所有社会关系，跨越阶级界限的互动充满了冲突和对抗。但是，只要阶级之间的交流和协商被包含在市场空间和价格机制内（在这儿唯一被准许的沟通是通过货币媒介来交流），阶级关系就井然有序并相对稳固。这与阶层之间其他形式的交流相反，如偷窃、怠工、生产率放缓、消费抵制以及个人暴力。所以，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企图约束交流方式和交互点，结果是现存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就只能被一种特殊的话语所表达，这便是货币。

资本家倾向于将货币作为阶级联系的重要媒介有多重原因：首先，如果阶级之间的联系被金钱往来关系所限制，控制最大利益分成者难免占优势。因此，谁最有钱——也就是谁最成功地积累了资本——就为控制被剥削者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而被剥削者则没有任何表达相反观点的基础。只要没有法律规定或礼仪风俗剥夺货币的控制权，所有阶级关系的情况都是如此。资本尽力尝试清除这些顽疾和障碍，这样就可以为货币建立一个理想的语境。新自由主义为了推行所谓的自由贸易施行了许多这样的策略。其次，货币是一种部分可控的语言。国家控制着并有能力去改变金融话语的规则，一旦社会关系并非为了选区全体选民而存在，它就会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发挥最大的影响。通过改变控制货币的法规或者货币政策，国家可以操纵货币话语（monetary discourse）的决定因素。举例而言，如果经济过热，或者说，工资协商中的谈判力转而支持工人阶级时，中央银行有能力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恢复至适当的权力不对称状态。第三，货币以一种所有商品化社会都能理解的话语去扩散权力。一旦社会被经济三位一体所统治，管控货币-资本流动的国别法（country-specific laws）被边缘化，社会权力就可以被普遍传播。随着金融和商品市场的全球化，货币迅速地将它的权力信息传递到全世界。没有阻碍，货币可以利用某个区域或范围内的有利条件，也可以逃离它遭遇阻

力的地方。全球货币系统让货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产业或区域传达它强大的意义。同样地，它使得贫困的威胁更加可信；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指向了所有无依无靠者，逼迫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屈从于资本主义劳作的规训。

货币是一个话语空间，权力关系在其中运作——这对于内部市场中的社会各阶层都是真实的。甚至通常被理解为不在金钱关系之内的领域，家庭，也同样可以被看作具有被货币调控的权力关系。虽然金钱无法将权力关系引入家庭，而且货币也远非家庭内部的唯一权力手段，但许多家庭内部的权力话语现在都通过货币来实现。在基本家庭²⁴（nuclear family）时代（1960年以前），丈夫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男人们对他们的妻子显然具有控制权。为了获得她们丈夫的钱包，女人们则被迫去索求、申请或者有时去偷窃（Zelizer 1997）。或许是女性摆脱丈夫金钱控制的斗争，使得女性们更加愿意去成为领工资的劳动力，即使她们经常需要做两份工作（无偿的家庭工作和有偿的专业工作）。²⁵

总之，一般等价物会传达各种信息：比如偏好、获利机会、信任、统治和社会权力。如果资本主义像它所指明的那样发挥功用，就不会有另一种现实可以替代它，而且照这样下去，系统的符号可以传达所有相关的知识、意义和经验。这样的话，资本主义几乎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所有元素，并侵占着宇宙的每个角落。然而，正如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那样，经济三位一体的规则既不是独霸的也不是无敌的。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不受资本逻辑的控制，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正不断地被那些反抗斗争所挑战。一些反抗发生在金融话语之内，同时另一些人拒绝用统治集团所设计并控制的话语来交谈。²⁶ 只要情况依然如此，资本主义

²⁴ 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译者注）

²⁵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阅读选集，参见 Malos 1980。（原作者注）

²⁶ 举例来说，乔治·卡芬特齐斯（George Caffentzis）和哈利·克利弗（Harry Cleaver）研究表明，无产

经济三位一体就不是一个完美的自给自足且自我指涉的符号系统。

结论

经济学家们尚未完全理解如金融危机、汇率动荡、金融恐慌这些金融现象的一个显见的原因在于，他们几乎只关注货币的经济功能而忽视它在经济学以外的意义。本文指出，货币会根据它调控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从而有能力去传达各种不同的意义和内涵。因此，符号学尤其适用于货币研究，它的方论论有能力去捕捉货币的滑动意义以及语境对于货币意义的重要性。²⁷

者以种种办法贬低金钱、削弱它所包含的权力信息，这些都在威胁着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再生产。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维维安·泽利泽 (Vivian Zelizer) (1997) 研究了人们寻求个性化货币的方式，这样货币就可以满足他们多元的社会联系，例如，个人的好友圈，家庭联系，与当局的互动，甚至是买东西和处理商业业务。虽然并不涉及符号学本身，但她写道：“人们为许多，甚至全部的社会联系形式指定不同货币，就像他们为不同社会语境创造独特语言一样。” (1997, 18-9) 大多数时候，这意味着钞票或金属钱币不再作为一般等价物参加循环，而是被指定用于某种特定的交易。泽利泽指出了这种实践的普遍存在，但是她的证据显示，这种特殊的指定很难超越货币的权力内涵，也很难超出一般等价物普遍流通的持续时间。最近，一个网站 (wheresgeorge.com) 可以通过输入钞票序列号来追查某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一切行踪。这个网站也运营着一些聊天室，在这里人们可以基于他们都使用过的某种货币，来打造一种联系。这一事件促使《美元和意义》 (Dollars and Sense) 杂志提出：促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联合的“不是爱情或自由，而是他们都有一张反复经手的、肮脏的、乏味的国债券 (treasury note) 。” (原作者注)

²⁷ 波兰尼 (Polanyi) 认为“货币是一个不完全统一的体系，只针对它本身的研究是一条死胡同。这解释了许多徒劳无功的研究，它们都试图去确定货币的‘天性或本质’” (1968 : 175)。相反，我们应该设法理

作者简介

卡尔·温纳林德 (Karl Winnerlind),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历史学教授。他专门研究 17、18 世纪欧洲的思想史和政治经济, 对货币和信贷的历史发展尤为感兴趣。出版有《信用伤亡: 英国金融革命, 1620 - 1720》(Casualties of Credit: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1620-1720) (2011), 与玛格丽特·夏巴斯 (Margaret Schabas) 合编了大卫·休谟的政治经济学。

原文题为 Money Talks, but What Is It Saying? Semiotic of Money and Social Control. 原刊载于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10, 35(3), 557-574.

